

# 2018年澳門文學研究綜述\*

趙 哲

**[摘 要]** 2018年澳門文學的整體風貌展現出都市文學形態日漸成熟的姿態。創作方面，無論從澳門文學本土創作的規模上還是從題材佈局上，無不顯示着本土創作力量愈發堅實的趨勢；文學研究方面，澳門學者和各地學者一致將目光轉向了澳門文學的跨語言特徵，以此論證澳門文學與漢語新文學的關係以及澳門文學特殊性所在，顯示出較為鮮明的時代特色；澳門文學一貫善於從多元文化背景和豐富多彩的文學周邊活動中汲取發展的養分，一年一度的澳門文學節以及各類紛繁的活動，為這座城市不斷增添文藝氣息。

**[關鍵詞]** 澳門 文學 都市文學 2018年 綜述

## 一、創作概況——靈感澳門，書寫都市本土意識

2018年度澳門本土文學的創作大事當屬《2017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及《2015至2017年度澳門演藝評論選》的出版，兩套選集均由澳門基金會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聯合出版，並於2018年11月17日在澳門塔石體育館舉行新書發行儀式。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澳門文化局局長穆欣欣、澳門筆會會長李觀鼎、理事長湯梅笑以及《2017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主編廖子馨、黃坤堯與數十位作者共同參與此次發行儀式。擔任《2017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主編工作的人員除了廖子馨、黃坤堯外，還有吳淑鈿和盧傑樺兩位，該選集一共收錄了百餘篇作品，包括15篇小說、20首新詩、30篇散文和40首詩詞，可謂是上一年度各類題材優秀作品的集合；而由周凡夫及莫兆忠主編的《2015至2017年度澳門演藝評論選》則分為“本地作者卷”和“外地作者卷”兩部分，其中“本地作者卷”共有58篇評論，“外地作者卷”則有26篇評論。《澳門文學作品選》和《澳門演藝評論選》均由澳門基金會與澳門文化局聯合出版，這項工作自八年前就已開始，這期間針對“年度優秀作品選”的編輯工作逐漸成為了澳門文學、澳門文藝創作及研究的一項“年度總結性”工作，無疑對推動澳門文學及演藝文化的發展起到不可取代的作用。對於澳門文壇來說，出版年度文選既可鼓勵優秀作品的產生，又可以作為資料供後人研究，

**作者簡介：**趙哲，徐州工程學院人文學院講師、文學博士。郵編 221018

\* 本論文為江蘇省社科基金項目（18ZWD005）、徐州工程學院2018年度校級科研項目“當代香港文學語言生態研究”階段性成果。

同時也能反映該年度甚至該時代文學、文藝創作與評論的面貌，增加澳門作品對外交流的形式與機會。<sup>①</sup>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在致辭中曾表示，文學是澳門軟實力的重要載體之一，近年澳門的文學工作者已開始注意到這種鮮明的特質，並着力通過自己的作品反映出這種特質。<sup>②</sup>不僅對這項工作給予了肯定，還指出了澳門文學發展帶來的重要文化意義。文化局局長穆欣欣在致辭中介紹到，近年來年度文選的投稿量一直在增加，從這幾年的文選編輯中不難看到澳門文學創作和演藝評論的纍纍碩果，也反映了澳門作家不斷提升的創作實力。並指出，為了保證年度文選的品質，保持高度的受認可性和精選性，主辦方和編委會一致認為有必要將工作做到精益求精，以呈現澳門文學及演藝評論的最佳面貌，不忘年度文選篩選精品的初衷。<sup>③</sup>由此可見，近年澳門文學正在穩步前進，這與澳門為文學的發展不斷創造有利的氛圍是分不開的。

具體來看，無論是小說、詩歌還是散文創作，皆能體現出澳門本土作者對都市文學恒常題材的嫻熟思考。小說創作方面，較有代表性的有水月的〈六根〉，雖然篇幅只有短短3,000字，卻在其中鑲嵌了一個精巧的愛情故事。作者在這個雙線格局中，安排主人公六根在18歲這一年背井離鄉，奔赴香港試圖闖出一番事業。二十幾年後依然沒有甚麼成就的六根因為“非典”而失去愛人，以後回到小城澳門，卻發現此時的澳門今非昔比，經濟水平與社會發展均已相當完善……看似尋常的“出走”故事，折射出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香港、澳門的雙城對比，也從側面反映了城市迅速擴張背後，人類最樸素的情感追求與急劇膨脹的物質需求之間的裂隙，雖簡短而深刻，體現了澳門本土作家對於城市本身那種既依賴又質疑的雙重思考；除了愛情題材，本土作家還善於將日常生活的平凡事物編織在文字之中，以作為反映現實或者批判現實的工具。例如梯亞的〈一輛失蹤的士〉，這篇文章可謂是小說中的“檄文”，正如廖子馨所言：“對澳門‘的士事件’極盡嘲笑、辛辣諷刺，是批判澳門社會現實較為有力的一篇。”<sup>④</sup>

詩歌方面，詩人們以敏銳的視角揭示出久居都市的生存狀態，立足本土，深入城市的每一寸肌理，並以深邃的思想為線索構築一幅幅澳門城市圖景。例如譚俊瑩的〈新娘的耳針〉，是將街道上黑白相間的斑馬線比作人體的耳垂，又把來來往往的行人想像成新娘的耳針，這其中黑白色彩成為了對未來生活種種不確定性的隱喻；又如穆欣欣的〈一座以灰為底的城市〉，也是通過色彩的識別構建城市特質的新詩範本，其中將各色美好事物、美妙聲音與天空中的灰色並置，反而有種為城市灰色霧霾開解的意味；澳門地狹人稠，城市空間向來是本地人頗為關心的問題，詩人雪堇以“旋轉木馬”作為意象，發出“我們早就奉上時鐘的指標／任其擺弄”的、淪為華麗的展示品的感歎，道出城市空間被遊客無休止擠佔的無奈之感；而詩人淘空了在〈我酷愛自由〉詩文中發出了“喜在天幕寫草書 像閃電”的感歎，更像是與狹窄空間長期抗衡之後的精神放逐，堅韌有力中透露出一絲無奈。除此之外，很多詩句中還不乏對城市現代化質疑的聲音，如海芸的〈八月的天鴿〉，“一連四句打破了蓮花寶地神靈護佑的迷思，智慧城市抵受不了天災的衝擊，

① 〈《2017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及《2015至2017年度澳門演藝評論選》新書發行〉，澳門文化局學術及出版處，<http://www.icm.gov.mo/academics/gb/news/75>。

② 〈《2017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2015至2017年度澳門演藝評論選》發佈〉，中國作家網，<http://wyb.chinawriter.com.cn/content/201812/21/content47587.html>。

③ 〈《2017年度澳門文學作品選》《2015至2017年度澳門演藝評論選》發佈〉，《文藝報》（北京）2018年12月21日。

④ 廖子馨：〈小說：恒常題材的不同處置之方〉，《文藝報》（北京）2018年12月21日。

越來越虛擬化的時代（大數據）面對自然界的具體和直接顯得不堪一擊”。<sup>①</sup>以及喬捷的“我喜歡大城市／只是怕無聊／我喜歡小城市／討厭長途跋涉／我想親親大自然／其實只是怕死”只用這短短幾句，以電子媒體的亂碼現象比擬都市人格，就顯露出都市的現代化對都市人格的異化作用。

散文與小說、新詩皆不約而同地將書寫題材指向了“我城”，尤其是經歷了百年難得一見的“天鴿”風災後，吳淑鈿這樣描述道：“2017年，颱風‘天鴿’無疑是最矚目的社會課題，不少作者積極流露由文學社會功能出發的創作動機。書寫方式則別具個性。有人現場報導（喬捷〈澳門關機〉）；有人傷感於‘虛張聲勢的浮華’被掃落得支離破碎，質疑城市的脆弱，呼喚危機的覺醒（譚健嶽〈‘天鴿’下的澳門〉）；有人從環保作反思，主張發展經濟的同時，也要尊重自然規律（劉居上〈For Save〉）；有人自災後松山的斷木新枝看見重生的希望（雅耶〈‘維納斯’的秋天〉）。作者們自風災中汲取創作的養分，不平而鳴，蚌吐明珠。”<sup>②</sup>總體來看，2018年度的本土作品呈現出澳門人對都市精神和物質兩個向度的深度依賴，本土作品逐漸剝離多元文化帶來的焦慮，開始關注城市內部肌理的各個方面，這也是城市文學的發展水平的一種真實寫照，亦可為當代文學發展提供一種借鑑。

## 二、研究概況——面向家國，回歸澳門本土情懷

本年度面向澳門文學的相關研究，整體數量雖然不是特別豐富，但針對於澳門本土文學的關注較之往年有着更加精準的着力點，研究成果的份量也隨之提升。澳門大學中文系朱壽桐教授的《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可謂是本年度有關澳門文學研究成果的重頭戲之一。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曾在2012年（澳門特區文化局成立30周年之際），計劃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出版“澳門文化叢書”，力圖通過此種形式推廣研究澳門與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學術成果，將“西學東漸”與“東學西傳”的樞紐——澳門及其本身的文化意義推介開來。這項工作迄今已有七年之久。這期間陸續出版了不少專著，研究內容立足澳門本土的地理、歷史、人物、經濟、文化和社會等方方面面，研究視點卻面向全球。而這部2018年出版的《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是繼2014年王列耀、龍揚志《文學及其場域：澳門文與中文報紙副刊（1999—2009）》之後，又一部針對澳門文學的研究成果，短短四年就有兩部有關澳門文學的專著在此出版，這樣的頻次也一定程度增強了澳門文學的活躍度。

《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以文學的核心載體——語言為切入點，以漢語文學的宏觀角度審視整個澳門文學，不僅能夠凸顯出澳門文學的交匯特色，還能夠在漢語新文學的系統中重新定位澳門文學，以至於用新角度觀照澳門文學本身與其他漢語文學的關係，具有相當重要的學術意義。從內容上看，該論著一共分為四編，分別是“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的重新認知”、“漢語新文學視閥中的澳門意象”、“澳門文學對漢語新文學的貢獻”、“漢語新文學格局中的澳門文學事業”。視點從澳門文學所能提供的獨特經驗到漢語新文學的整體形態，在聚焦（微觀）與延展（宏觀）的輪轉中，勾勒出澳門文學與漢語新文學整體的關係。澳門文學跨媒介活動與跨媒體形態的不斷發展進一步推動澳門文學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澳門文學這種特殊的文學生態為漢語文學在當下語境中如何生存提供了一種可行性極高的路徑。其實，從漢語新文學概念的提出

① 盧傑輝：〈新詩：書寫城市生活的哲思〉，《文藝報》（北京）2018年12月21日。

② 吳淑鈿：〈散文：不約而同 擁抱我城〉，《文藝報》（北京）2018年12月21日。



就可以看到這是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在語種和意義雙重視角下的重新概括，甚至還包含了時間的界定。<sup>①</sup>同時朱教授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這種命名形式也表示出了深刻的反思，他在〈論漢語文學與文化·代後記〉中指出：“人們太習慣於‘中國文學’以及‘中國現當代文學’之類的伴隨着嚴肅國體意識的學術概念，它們都是那樣地明確、簡單、順妥，以至於任何人可以不假思索地接受它們，運用它們。然而正是這種不假思索的接受和對近年來中國現當代文學幾種命名的反思運用帶來了許多足以引起思索的罅隙。”<sup>②</sup>朱教授對命名的反思也折射出他對於這個學科本身的深刻思考：“作為中國現代文學與中國當代文學相整合的概念，一個叫作‘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臨時性學術概念和明顯拼湊型的學科名稱便就此出爐，並在相當長時期內成為漢語新文學領域最具權威性和最富範導力的概念，其影響正越出中國內地而輻射到港澳台乃至於國外的漢語文化圈。‘中國現當代文學’作為正式的學術概念，無論是在內部關係還是在外部關係上都失去了概括力度以及延展的張力。”<sup>③</sup>而“漢語新文學”的概念從本質上解決了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港澳台文學、海外華文文學之關係的難點，正如張福貴教授所言：“如果作為朱壽桐提出的‘漢語新文學’的概念來建構文學史的話，就可以實現我一直主張的文學史寫作的‘融入’原則：不以區域為標準，而是以文學價值和影響力為標準，將台港澳文學按照時段分別納入到大陸文學大系統之中進行考察和取捨。”<sup>④</sup>以語言為融合點，將澳門文學放置於這樣一個更具包容性的體系中，更便於回到文學本身，看清澳門文學最本質的內容所在。

更有學者提出了以語言為契機，構建世界華文學術期刊評價體系的設想，任全娥提出了“世界華文學術期刊”的概念，認為“中文學術期刊”應當是包括中國港澳台地區以及外籍華人編輯出版的“中文學術期刊”的總和。<sup>⑤</sup>澳門理工學院學報劉澤生總編輯認為：“在文化研究的語境下，所謂‘華文學術期刊’大致上應該是涵蓋兩個大的板塊，即包含了中國內地和台灣、香港和澳門三大地區的中文學術期刊，以及廣泛分佈於東南亞、大洋洲和北美洲等地區的以華文為其主要文字的海外學術期刊。海外華文學術期刊是期刊家族中的一個特殊群體，是一種特殊的歷史現象組合。”<sup>⑥</sup>對於目前港澳台地區的學術期刊未能被“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HSSCID）、“中國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CSSCI）正式收錄這一現狀，劉澤生表示十分遺憾。

張堂錡教授的《邊緣的豐饒：澳門現代文學的歷史嬗變與審美建構》作為台灣第一部研究澳門文學的學術專著，可謂在華文文學研究版圖上，填補了一片重要的拼圖。<sup>⑦</sup>這也是澳門文學研究視野的又一次重要拓展，張堂錡教授先從澳門文學與世界華文文學這一宏觀視角談起，為澳門文學再次發聲。全書分為三個部分，分別是第一輯“澳門現代文學的傳統風貌與發展軌跡”、第二輯“新世紀／回歸以來澳門現代文學的創作趨向”、第三輯“澳門現代文學的海外傳播與區域流動”，結合了時間的歷程性發展對澳門現代文學的整體風貌和特殊性生態進行深入探討。該專

① 張福貴：〈近年來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幾種命名的反思〉，《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北京）2016年第9期。

② 〈代後記〉，朱壽桐：《論漢語文學與文化》，澳門：銀河出版社，2015年。

③ 〈代後記〉，朱壽桐：《論漢語文學與文化》，澳門：銀河出版社，2015年。

④ 張福貴：〈近年來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幾種命名的反思〉，《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北京）2016年第9期。

⑤ 任全娥：〈構建世界華文學術期刊評價體系的設想〉，《澳門理工學報》（澳門）2018年第2期。

⑥ 劉澤生：〈華文學術期刊的幾點思考——以《澳門理工學報》為例〉，《總編視角——華文學術期刊發展趨勢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

⑦ 〈我們在台北選了30本書，與你分享閱讀的快樂〉，[http://m.sohu.com/a/296088845\\_100191009](http://m.sohu.com/a/296088845_100191009)。

著分別從小說“道德教化”敘事傳統的形成與形態、女性散文的抒情傳統與批判意識、女詩人的世代書寫、土生葡人作家小說中的華人女性形象等方面總結了澳門現代文學的發展軌跡與特殊品格；從新世紀與澳門回歸的時代背景中，暢談澳門小說的“回歸書寫”與澳門形象，並梳理了該時期澳門現代文學發展的趨勢；最後從傳播與受容的角度分析澳門文學與台灣文學關係史研究體系的建構問題，探討澳門現代文學在跨區域流動中的域外傳播。在這部專著中，有不少內容都是首次提出，這為澳門文學形象提供了不少新鮮的論點。在澳門文學與華文文學的關係探討中，也充分顯示出澳門文學的獨有價值，有必要讓更多的讀者走入精彩的澳門文學世界中來。

本年度澳門文學研究的又一部力作是施議對教授的《澳門記略——所載詩文研究》。《澳門記略》作為歷史上第一部系統性地介紹澳門的著作，本身就應得到澳門研究者的關注，而施議對教授以《澳門紀略》中所載的詩文作品為研究對象，角度更是新穎合理。施教授認為：“《澳門紀略》所載詩文作品，又以詩人的眼光審視澳門，以詩人的立場印證史跡，成為今日探尋澳門文學發生、發展的重要依據。”<sup>①</sup>該書從《澳門記略》所載詩文作品入手，除了以詩證史、以文證史的作用之外，這些詩文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澳門歷史發展的風貌，能夠作為澳門歷史的一種有力補充。此外，文章還通過大量的詩文分析，從地脈、人脈、文脈的綜合角度來考察，試圖探尋澳門文學的發生、發展的歷史進程。結合了大體量的詩文論證，經過嚴密地推論，最終得出了澳門文學淵源於文天祥的伶仃洋這一結論。在論證過程中，該書將詩文文體歸類，“文”的方面主要分為奏啟和序志兩種類別；“詩”的方面從題材分為自然物象和社會事相兩個層次。並在“於二百年再加上二百年所展示的大背景”和“由湯顯祖香山鑿到文天祥零仃洋所展示的大視野”中，將“伶仃洋與文天祥”、“黃楊山與張世傑”以及“墓之碑與碑之歌”这三則事證作為探尋澳門文學淵源的一個重要依據，並從地脈貫通、人脈貫通以及文脈貫通三個方面，論證澳門文學的緣起，可謂一大重要的發現。從新穎的角度出發，重新發掘出現存文獻的學術價值，進一步拓展了澳門文學研究的深度。

本年度有關澳門文學的幾次學者對談亦頗為引人注目，有劉再復、朱壽桐、盧新華澳門對談以及對劉登翰研究員的訪談。朱壽桐從語言的角度分析了語言對於文學乃至文化的反作用：“社會語言學和文化語言學研究的結果早已證明，語言之於文學的意義不僅僅是其外殼，是其物質呈現，而且是其特定方式的結構者，甚至是其結構的組織者，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定的語言不僅受制於一定的思維範式，而且還反過來決定這種思維的基本模態以及表述途徑，語言對思維有着明顯的反決定作用。特別是在文化表達和文化呈現方面，語言對思維的決定性往往高於思維對語言的決定性。”<sup>②</sup>這為澳門文學的發展及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學術視野，“澳門文學和澳門作家不僅通過自己的文學實踐贏得了自己在漢語文學世界的地位，而且也為漢語文學世界提供了有價值的結構形態和特別的經驗。這種特別的經驗和結構形態既是澳門文學的個性，也是澳門文學對漢語新文學世界所做出的不容忽略的貢獻”。<sup>③</sup>同時也指出了今後澳門文學及相關研究的思路，“將不同地區、不同背景的漢語新文學寫作放置於同一個平台，同時，將漢語文化區塊的所有組成部分都平等地納入這個平台進行審視，客觀上要求包括澳門文學在內的所有地區性的文學研

① 施議對：〈《澳門紀略》及其所載詩文研究〉，《國學學刊》（北京）2014年第4期。

② 莊園整理：〈華文文學的啟蒙與漢語文化的重建——劉再復、朱壽桐、盧新華澳門三人談〉，《華文文學》（汕頭）2018年第2期。

③ 朱壽桐：《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8年。

究，都須以漢語文學的整個歷史和整個平面為參照、為歸屬，這就在學術前提下避免了或者克服了澳門文學研究或澳門作家研究以澳門為限的傾向與習慣”。<sup>①</sup> 朱教授建議今後的研究要去掉區域文學研究僵化的模式，以文學本身的實際出發，在開放的視野中踏實地進行文獻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

而劉登翰研究員在訪談中，也強調了澳門文學的特殊性，“20世紀80年代，從大陸、香港、東南亞移居澳門的新移民很多，他們的到來改變了澳門的社會和人口結構，也改變了澳門的文壇結構。這些合作者都是澳門的新移民，他們既是澳門文學的主角，也是澳門文學的研究者，雙重身份的疊合……澳門的傳統文學發端於明末遺民的避居，新文學發展遲緩，其在歷史上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驛站和葡萄牙較長時間的佔領，催生了一批葡澳‘土生’作家和文學，成為澳門文學一道特殊的風景線。它們（港澳台文學）都為豐富中華文化和中國文學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文學經典”。<sup>②</sup>

### 三、文學周邊概況——“泛文學”觀，為澳門文學增姿添彩

2018年澳門文學及文學周邊豐富多彩的相關活動無疑是該年度澳門文學研究的一個焦點。2018年3月10—25日，第七屆“雋文不朽”澳門文學節如期舉行。澳門文學節由澳門本地葡文報紙《句號報》於2012年發起以來，至2018年已成功舉辦了六屆。該文學節作為首個匯聚中國與葡語系國家文化藝術工作者的文學交流盛會，六年來每次舉辦都被視為小城澳門的一樁文化大事。隨着澳門文學節發展的相對完善，有諸多活動環節已經相對固定，就連文學節始終不變的主題——“雋文不朽”，也早已成為澳門文學節標誌性的符號，分別對應的葡萄牙語和英語分別是“rota das letras”和“the script road”，寓意是文學道路的歷程性和長久性。據瞭解，澳門文學節歷來邀請作家時，都十分注重該作家與澳門的文化淵源，而且並不局限於葡語國家的作者，因此每年都會不計地域限制，向海內外著名作家、出版人、翻譯人員、記者、音樂家、導演及視覺藝術家等“泛文學”相關的各界人士發出邀請。這六年來，一共邀請了來自不同國家的文化藝術工作者百餘人。例如內地作家王安憶、余華、秦文君、楊紅櫻等均受邀參加過澳門文學節。2018年度邀請到的內地文學和藝術界知名人士有阿乙、尹麗川、于堅等。該次文學節一共設有“寫作工作坊”、“音樂會”、“作家和他們的作品”、“電影放映”、“文學節走進校園活動系列”、“走進圖書館”、“表演”七個系列共100多場主題活動，在15天的活動日程中，每天都分別有漢語、英語和葡語不同語種進行的多場文學活動，不斷為小城文學的常態化增姿添色。

正如澳門文學節的成功舉辦是將文學觀念延展在媒介間際、學科間際和文化間際的自由象限，並沒有把文學之界困囿於文學本身一樣，該年度“泛文學”交流活動雖然不直接指向文學，卻對文學及其賴以生存的環境帶來深遠的影響。在2018年4月24—27日於澳門理工學院舉行的“華文學術期刊轉型暨《澳門理工學報》創刊二十周年研討會”便是一場成功的泛文學交流盛會。與會人員分別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吉林大學、南京大學、華中師範大學、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澳門科技大學等高校及科研機構，以

① 朱壽桐：《漢語新文學與澳門文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8年。

② 龍揚志：〈華文文學的文化視野與學科建設——劉登翰研究員訪談錄〉，《文藝研究》（北京）2018年第3期。



及《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等文摘和評價機構。與會代表一致認為，澳門本土的研究刊物站在了澳門特殊的地理文化交匯點，有着可以博採眾家之所長，相容並蓄的優勢。這些學術期刊在幾十年的磨礪中，學術水平和編校品質得到學術界、期刊界和讀者的廣泛認可。雖然活動是圍繞着期刊視角展開的，但澳門作為中外文化交匯最為集中的地區之一，在這裏辦好中文學術期刊，既有展示和傳播中國文化的意義，同時也有吸收外國優秀學術思想的意義。<sup>①</sup> 例如2018年10月29至31日在澳門理工學院召開的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第十七屆年會暨“澳門與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由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名譽會長湯開建致辭。研討會有分別來自內地、港澳台及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家和地區的60多位學者出席，共發表論文40篇，其內容涉及澳門史、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天主教在華傳教史等諸多方面，會議議題雖然很廣泛，但是特色十分明顯，就是對域外新材料的挖掘和利用，甚至不限於文字材料，對雕塑、畫像、照片等非文字類的資料，也被納入學者的視野之中，由此在研究上取得了較為明顯的突破。<sup>②</sup> 在澳門文學從未自我設限的“泛文學”的觀念下，豐富多彩的文學及周邊活動不僅為澳門文學活躍了的創研氛圍，還能夠在各界專業人士的指引下，深入挖掘澳門的歷史文化意義。

總之，創作與出版領域依舊堅守立足本土的態度，而所涉及的題材也逐漸穩定在都市恒常的範圍之內，傳遞着澳門作者對於這座城市空間的獨特情懷，無論是創作和出版的體量還是品質上，不無體現出澳門文學思想的深度不斷拓展；隨着相關研究成果的不斷積累，在本年度的專著、專家對談等形式中均能體現出學界對澳門文學所提供的特殊研究視角的關注，凸顯出澳門文學本身的價值所在；在媒介融合的時代背景下，澳門文學善於向大眾媒介“借力”，由文學引發的各類豐富多彩的活動又可以反哺文學乃至文化的發展，毫無疑問，澳門文學的“泛文學”觀念是十分成功的。由此可見，在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澳門文學乃至澳門文化的能見度日益提升，在都市現代化的語境中盡展風彩。

[責任編輯 陳超敏]

① 〈澳門理工學院舉辦“華文學術期刊轉型暨《澳門理工學報》創刊二十周年研討會”〉，澳門新聞局，2018年4月24日，<https://www.gcs.gov.mo/showCNNNews.php?DataUcn=124360&PageLang=C>。

② 〈“澳門與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召開〉，《澳門理工學報》（澳門）2018年第2期。